

# 从中国 60 年两次制度变迁 再反思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迥异

靳 涛 张建辉 褚 敏

**内容提要** 新中国 60 年两次相反的经济体制转型不仅影响了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也对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和演化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和影响。经济体制转型的发生使经济学关注的焦点从标准的价格与货币理论转向对产权和制度环境的研究。从新中国 60 年的发展经验看,经济体制对经济运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经济体制转型则是受其内在经济系统复杂运动与演进的初始状态和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影响和制约。本文的研究视角就是新中国 60 年的经济体制转型,能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中央计划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

**关键词** 计划体制 市场体制 经济体制转型 比较与反思

靳 涛,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361005

张建辉、褚 敏,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生 361005

在新中国 60 年经济发展史上,经济体制转型无疑是最突出的事件。20 世纪两次相反方向的经济体制转型不仅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也深深地改变了世界<sup>①</sup>。

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为什么会走上计划经济体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为什么会走上计划体制道路,可以归为以下三个方面缘由:

1. 自由放任的市场体制的弊端

20 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越来越多,特别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8 年

11 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 年 9 月)爆发的 21 年间,资本主义先后爆发了 1920-1921 年、1929-1933 年及 1937 年到 1938 年的三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其中 1929-1933 年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以后接着又是持续的萧条。

即使在当时经济相对更发达的和更富裕的美国 20 年代,工农群众的生活仍然十分贫困。这个时期推行的“产业合理化”使劳动强度明显增大,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工资的增长则要慢的多。如 1913 年至 1929 年,加工工业中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65.5%,工人的实际工资(考虑到失业者)只增加了

本文系 2009 教育部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转轨深化、经济结构调整与可持续发展”(批准号 2009JJD790039)和 2009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中国 60 年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与经验教训研究”(批准号 09BJL002)前期研究成果,且获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资金资助。

26.1%。农业工人的收入更低,只有产业工人收入的 1/3 左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除几年稳定时期外,资本主义经济多陷于混乱、危机与萧条之中,世界政治中则是多种矛盾错综复杂,冲突不断,险象环生。

在 1929-1933 年这次危机中,美国失业人数达到 1200-1300 万(约占劳动人口的 1/4,如加上半失业者,则共计有 1700 万人。在工业、运输业及建筑业中,工业失业率高达 45.6-47.8%,危机期间工人工资比 20 年代后起下降约 1/4(把失业者考虑在内),即退到了 1900 年的水平。德国 1932 年的失业率已达到 43.8%,1932 年德国的全失业和半失业率共达 66.4%,即占德国工人总数的 2/3,约有半数失业者领不到失业金。在英国,1932 年工人失业人数达到 300 万,煤矿业失业率为 34%、冶金业为 47.8%、造船业为 61.7%。1929-1932 年,每年平均参加罢工的人数超过 40 万。法国、日本情况也是同样糟糕<sup>[2]</sup>。

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国内、国外矛盾(民族矛盾、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等)交织在一起,广大民众对现实的不满更加强烈。

在经历了这些年经济危机和战争冲突的打击后,许多仁人志士都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如经济危机、工人失业、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等问题都是市场体制自身产生并难以克服的。

## 2. 计划体制的理想与神话

(1) 苏联中央计划体制的示范 从 1926 年至 1941 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开展及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在重化工业和国防工业取得的巨大成绩拉近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sup>[3]</sup>。1941 年 6 月,德国法西斯入侵,苏德战争全面爆发,苏联的计划体制充分显示了其优越性。在法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国家在德国法西斯面前不堪一击的情况下,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苏联抵住了德国的疯狂进攻,并最终打败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这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优越性,为二战以后许多国家走上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打下了伏笔。

(2) 德国法西斯的反证 德国在第一次大战后,经济混乱,失业率高涨不下,工人罢工频繁,人们对《凡尔赛和约》普遍不满。希特勒法西斯党徒在德国开始蠢动,他们利用德国劳动者力图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情绪和反对垄断资本家剥削的意愿,打着“民

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号,极力欺骗广大德国人民,由于国际垄断资本同德国反动统治力量的勾结,德国人民防止希特勒法西斯的斗争没有成功,德国法西斯开始夺取政权。德国法西斯上台后,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国家对经济实行全面的干预和调节<sup>[4]</sup>,经济发展较快,军事经济潜力迅速恢复。德国法西斯上台后推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计划调节模式)的较短时间经济迅速恢复和在二战中表现出的强大国力、军力,也使人们相信国家计划体制的优越性<sup>[5]</sup>。

(3) 凯恩斯的国家调控和罗斯福的“新政试验” 1932 年,在经济危机和阶级矛盾最严重的时刻,民主党人罗斯福当选总统。新政政策的基本措施是:清理银行,存款保险,发放巨额贷款给金融界,货币贬值,黄金国有和收购白银等等。通过“产业复兴法”消除“不公平竞争”,不得不考虑工人的利益,通过“产业复兴法”,在法律上承认工人的一些权利。积极兴修公共工程,刺激需求,扩大就业面(1933-1942 花费 170 多亿美元的巨款执行公共工程计划)。积极干预农业生产,使农民减产增收。积极发放“住宅贷款”和“失业救济金”,一方面刺激需求,另一方面笼络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失业者的情绪。这与凯恩斯《通论》的精神不谋而合。罗斯福邀请凯恩斯为美国经济顾问,凯恩斯多次到美国,受到罗斯福总统的盛情款待。这种政策绩效虽然在 30 年代并不突出(如在 1937-1938 年经济危机中),但从稍长时间来看,这种经济政策还是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如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也有力的说明了计划经济在当时人们思想中的主导地位(国家调节其实就是一种计划)<sup>[6]</sup>。

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计划体制在当时人们的思想中明显占优势地位,二战期间,哈耶克从奥地利移居英国,在一次就职演说时,他向同学们宣讲自由市场经济的好处时,受到学生们的嘲笑。在《哈耶克思想精粹》中文章回忆到,当时人们的思想都倾向于社会主义计划体制<sup>[7]</sup>。在当时从 20 年代到 40 年代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论战中,计划体制也是占上风的。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提出“长驱直入的社会主义”之后,也认为社会主义会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熊彼特,1942)。

## 3. 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

1917 年 10 月 24 日爆发的“十月革命”,诞生了

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并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发现其实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怎样运行人们了解的并不是很多,因为即便是马克思的理论也是框架性的。当时,在人们思维中,计划体制总是处在市场体制的对立面,社会主义国家用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代替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体制也就成为理所应当。革命胜利后,苏联建立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也就毫无悬念。二次大战结束以后,东欧各国在苏联的帮助和本国抗击德国法西斯革命的胜利后,也纷纷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并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政权,选择像苏联一样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体制也是当时条件下的一种必然。

## 二、中国为什么会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

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所造成经济绩效的下降是和这种体制的本质属性联系在一起的,由于计划体制所实行有计划按比例生产规律和市场规律、价值规律的冲突,从经济的长期发展来看,造成经济运行的低效是不可避免的。

### 1. 增长率递减趋势

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 1952-1978 年,中国经济增长按可比价格计算的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 7.9%、8.2%、6.0%(见表 1)<sup>[8]</sup>。

表 1 1952 年-1978 年中国经济增长指标(%)

时间段	社会总产值	工农业总产值	国内生产总值	国民收入	积累率
“一五时期”	11.3	10.9	9.1	8.9	24.2
“二五时期”	-0.4	0.6	-2.2	-3.1	30.8
1963-1965	15.5	15.7	14.9	14.7	22.7
“三五时期”	9.3	9.6	6.9	8.3	26.3
“四五时期”	7.3	7.8	5.5	5.5	33.0
1976-1978	8.1	8.0	5.8	5.6	33.5
1953-1978	7.9	8.2	6.0	6.0	29.5

注: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积累率按现价计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司编《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第 2、4-46 页,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7 年版。

从表 1 可以看出,中国在建立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体制后,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但从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来看,在排除一些特殊因素如三年自然困难等因素的影响外,可以看到中国的经

济增长的变化趋势是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趋势是相同的,也是经济增长指标的增长速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明显下降的趋势。

通过上述中外各社会主义国家资料的比较和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是一种可以在短时间内建立起的促使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制,但这种体制所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并不能持久。

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国家之所以在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建立之初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在体制建立之初经济非常落后,是在一个非常小的基数上起步的<sup>[9]</sup>。如按林毅夫等的计算,在中国按 1952 年不变价格计算,中国工农业总产值在 1949 年只有 466 亿元,1952 年也不过 827 亿元,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仅分别为 86.03 元和 143.87 元。较小的基数成为支撑中国等新兴社会主义国家快速发展条件的重要特征之一(林毅夫 蔡昉 李周,1994)。虽然社会主义快速发展有各种各样的有利条件,但任何忽视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体制本身所发挥的作用是站不住脚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主义国家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了工业门类齐全的国家经济体系,并快速缩短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特别在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倾斜发展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国家的重、化、生产资料工业和国防工业快速发展和兴起,并带动了相关其他行业的快速发展。在计划体制的作用下,逐步形成以国有工业为主,集体工业为辅,中央和地方各成体系,大中小企业齐头并进的发展局面。所以,计划体制在特定时期内对经济发展的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

传统经济体制尽管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带来较高的经济增长,但其内在制度结构造成的劳动激励不足,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经济结构扭曲等弊端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传统计划体制在强调分析阶级斗争的同时却假定阶级内部的同质性,没有对阶级内部的责任与义务、收入与付出、激励与约束的制度安排予以足够重视。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也存在着资源的稀缺性与人的私欲性的矛盾,社会主义内部也是不同质的,社会主义内部产权结构也在某些方面严重制约生产力的发展,这就导致社会生产率低下,人们工作积极性不高,人民生活相对贫困。另外,随着精神激励的递减效应,其对经济的影响能力也会日益下降。在上述种种因素影

响下,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趋缓或下降,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如苏联在战前 10 年间(1928-1937),国民收入几乎每 5 年便翻一番。但战后,增长速度逐年下降,1945-1950 年为战后恢复时期可以不考虑,1951 年为 12%,1952 年为 10%,1953 年又下降为 9%<sup>[10]</sup>,这都充分说明了上述问题。

## 2. 计划体制的内在缺陷

从计划体制的所有制结构来看,由于公有制主体的自利性与差异性的存在,每个经济主体都希望社会的资源配置能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也就是希望按自己的目标来影响中央的计划目标,这样必然造成中央计划目标与实际的偏离。从计划体制的运行动力来看,按劳分配作为一种“激励兼容”的体制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动力因素。但由于计划体制经济中的按劳分配对信息有着严格的要求,而从计划体制运行实际来看这些信息条件是中央计划体制无法满足的,这必然决定按劳分配的动力机制在计划体制中是起不到作用的。实际实行的是按职务和级别分配,这也进一步说明了计划体制的低效率。另外,由于中央计划体制的层次多、结构复杂,使得非现场决策成为经济决策的普遍特征,因而决策效率低是一种普遍现象。计划是建立在中央计划部门的理性之上,而中央计划部门的理性决策又是建立在对各地信息了解的基础上。由于信息的收集具有不完全、偏差和滞后的特点,再加上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相比信息传输的环节多、链条长,以及计划执行期间的实施时滞等因素的影响,这都使得中央计划部门的决策与实际情况出现偏差,计划体制所设想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不可能达到的<sup>[11]</sup>。

毛寿龙认为:“建立计划体制的起因是想节约市场体制的交易成本,把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直接统一起来,从而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但是,由于在可分配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按劳分配在技术上很难实现,因而在实践中按劳分配变成了简单易行的固定工资制。这就制约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于是,为了保证计划体制的经济效率,计划体制建立了系统的行政监督制度。实践表明,行政监督不可能以较低的成本来改善计划经济的效率,而思想政治工作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于是低效率就成了计划体制中普遍存在的老大难问题。”<sup>[12]</sup>

“由于传统计划体制下的财政体制在运行过程中高度地依赖于政府强制与政治动员等非经济因素

的集中控制,而导致了普遍的财政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才使财政体制改革(变迁)被迫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器而凸显出来。”<sup>[13]</sup>郭灿鹏还认为,在计划体制国家,政府通过价格管制的分配效应来实现财政资源的占有和配置的结果,一定会使得政府压低农产品和原材料价格,通过价格“剪刀差”把农业等部门的剩余资金转移到工业部门,并以此作为强制性积累机制。这必然造成价格和结构的扭曲(郭灿鹏,2001)。林毅夫等也认为,计划体制的赶超结构和重、化工业的发展战略也必然会造成工业结构的扭曲和弊端(林毅夫等,2000,2002)。

由于计划体制的种种弊端,从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就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是逐渐探索逐渐明确的,虽然改革已经走过了 30 年,且在 1992 年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但就中国目前市场经济的完善程度而言这个过程仍没有结束。

## 三、为什么社会主义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从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起源和运行机制来看,它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市场经济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这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集权体制下可以建立有效的新型市场体制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市场体制和民主、自由和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而把社会主义和专制、公有制和计划体制紧密结合在一起,以至于在人们的头脑中就会把在社会主义制度看成和公有制、计划体制和个人选择的不自由相等同,而把市场体制和民主、私有制和市场体制相等同,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从许多国家经济发展和历史过程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集权体制与经济增长是不矛盾的,如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其经济发展最快速的时期完全是军人政府执政和独裁统治的时期,这就充分说明集权体制下可以建立有效的新型市场体制。

### 2. 社会主义可以与市场体制相结合

社会主义与市场并不矛盾,只是人们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中出现偏差才造成社会主义和市场体制水火不容的表象。社会主义正如其早期人们理解的那样,它只是相对于个人主义的一种观念,并不是指政治上特定社会的组织方式。所以,可以认为公有制、计划体制、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传统制

度模式与社会主义思想并不一定存在本质的关联。哈贝马斯就认为,在经济领域本身,指导原则是盈利、效率和成功,而正义、团结、关怀等通行于生活世界的原则和价值,只能通过福利国家的事后调节来体现<sup>[14]</sup>。所以,我们可以在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的结合时,把市场原则和社会主义伦理道德结合起来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正精髓。市场原则就是把经济合理性的原则限制在市场发生作用的经济领域<sup>[15]</sup>,而在其他领域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和观念的建设,如强调社会公平、社会福利最大化和道德伦理等方面。

### 3. 市场体制具有多样性

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是关联的,但不是决定性的。二者改革的次序也是既可以同步也可以不同步的,并且选择一个合理的次序对于改革和转型结果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中国的转型过程,就因为还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还在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西方学者就简单的判定由于当政者没有变化,社会主义制度也没有改变,就认为中国是改革而不能是转型,这是典型的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决定论。其实从中国经济的本质和经济体制运行的内涵来看,中国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西方学者这种把政权与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而忽视经济体制本身和社会内在变化的思路和观点是一种最明显的简单化和绝对化,可以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原教旨主义。因为中国目前的改革已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运行调节的主要方式,并已初步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改革和前苏、东国家的对计划体制所做的修补和尝试的计划加市场的改革是明显不同的。中国成功走向市场体制是一种“质变”和转型,它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改革。

另外,就国外实行市场体制的国家来看市场体制也有多种形式,有政府有调节的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美国模式)、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日本模式)、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德国模式)、计划市场经济模式(法国模式)等许多类型的市场体制,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能算是一种市场体制哪?它和其它市场体制一样应得到承认和认可。

南开大学的学者张仁德等人在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要素综合分类的基础上将经济体制大致分为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体制两大类,然后,在按两种体制实际所呈现出的历史特征,分别将其归类为古典体制、现代体制、传统体制和改良体制,最后,再根据经

济体制的构成要素某方向最为突出的特征,将现代体制分为有调节的市场经济和不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将改良体制分为自治社会契约经济和行政分权计划经济等(见图 1)<sup>[16]</sup>。从该图来看,中国和前苏、东等转型国家目前都应该属于市场经济体制大类中的现代体制亚类中。当然,它们可能在更具体的小类中存在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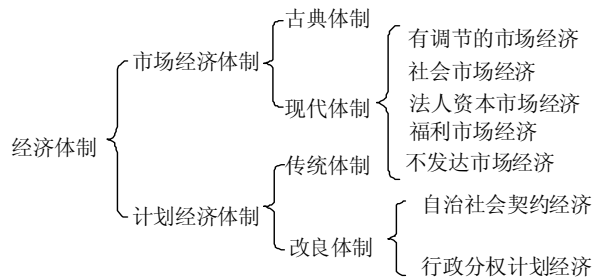


图 1 经济体制分类图

## 四、从新中国 60 年历程的反思中对两种体制的新思索

### 1. 对计划体制的新思索

在上个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的影响下,人们当时对资本主义市场体制深恶痛绝,普遍把“社会主义将会消除这种弊端的许诺更是主旨性的东西了。这些从经济方面为社会主义辩护的理由显然不仅支配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而且也支配着二次大战前和后的其他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而且也支配着二次大战后的其他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包括英国的新费边主义者的思想。”<sup>[17]</sup>“人们认为,有几个因素使社会主义能够消除同时存在的不合理的过剩资本、失业和未满足需求。首先,社会主义将具有自然的、而不是像私人利润追求下毫无节制的倾向,来充分利用现有的经济发展潜力。……其次,由于明显的原因,社会主义政府将承担劳动力充分就业义务,并因此在投资政策中(包括更换过时的设备),努力保持资本集约和劳动集约的适当的平衡。第三——这可能是最概括的论点,社会主义可以通过灵活地调整价格和工资,把国民产品和产出潜力很好地协调起来。”<sup>[18]</sup>由于人们对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有着良好的预期,所以在第一次转型中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长驱直入”也是合乎道理的。

计划体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如社会主义国家在稀

缺资源调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间的流逝,计划体制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美国经济学家利奥·赫维兹在其创立的经济机制设计理论中分析了经济体制运行的两个重要问题,即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按胡震等的观点,“计划经济由于采用行政权力协调的方式配置资源,难以解决上述两方面的问题。在信息机制方面,迅速完成中央计划机关及时掌握和处理复杂多变的供需的正确包含亿万万个变量的模型计算,并将根据这种计算编制统一计划,及时层层分解下达到执行单位去,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激励机制方面,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无法将个人利益同资源利用紧密结合起来,抑制了生产单位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所以说,这种主要靠行政命令的方式来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是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的。”<sup>[19]</sup>

南斯拉夫的经济学家教授德·马丁塞尼奇也认为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成功的动员和活跃了当时所有的生产潜力”。但是这种体制限制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无论是劳动者个人还是劳动集体,都不能发挥经济决定主体的作用”,“而且他们的行动自由也大大受到文件资料上呈下达的限制,这些文件资料向下有命令和指示的性质,而往上就是汇报汇报指示情况以及提建议和意见等”<sup>[20]</sup>。由于上面对下面的情况的不了解,而下面又往往很难理解上面的意图,这种体制的必然结果就是基层生产人员缺乏工作热情;另外,由于分配中平均主义、物质激励的缺乏、基层生产单位没有成本约束和预算约束,这都必然导致企业隐瞒生产能力和降低生产效率,这也决定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往往是粗放型的增长,进而这也决定了从长期来看这种增长很难持续。

波兰经济学家斯·英德里霍夫斯基<sup>[21]</sup>也认为,“在国民经济发展的某一时期,实行中央集权的体制有助于集中力量完成全国性的重要任务。但是这一过程不宜太长。因为经济管理权过于集中,必然会束缚企业的自主性,使经济的发展丧失动力。”<sup>[22]</sup>既然计划体制是一个在特殊情况下适宜采用的体制,那么这种体制在什么情况下适用呢?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体制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但要做到有计划按比例必须保证政府充分掌握全国各个层面的发展信息和拥有各个方面的知识,也就是说政府的“理性”必须足够大;社会主义计划

体制下公有制按劳分配原则发挥作用的激励条件是所有公民真正做到人人平等、利益一致和劳动的自觉性;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下的优先发展战略又必须保证人们的消费需求相近;当然,在计划体制下还有最重要的保证是人们在公有制条件下的高昂的工作积极性。只有上面这些条件能够得到满足,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优越性才能真正发挥作用。那么,上述条件又在哪些条件下可以满足呢?首先,从社会主义的集权计划体制来看,由于人类(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理性有限,政府计划部门没有能力保证国家经济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保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只会某一个特殊阶段的期限内,通过集中配置资源,可以较好的满足国家特殊利益的需要。所以,当一个国家遇到特殊困难和面对一个大的挑战时,如战争、灾害或者面对一项重大的任务时(如快速发展工业化、加快军事工业发展或攻关某一重大课题时<sup>[23]</sup>),此时由于计划体制在集中调配国家资源方面的优势,所以该体制在此时的优越性会很大。此时,计划体制发挥作用的原理是“放大效应”<sup>[24]</sup>和“替代效应”<sup>[25]</sup>。其次,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激励原则来看,按劳分配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由于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人,此时,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就无法实施。这种分配原则由于是和社会主义高积累和高福利原则集中在一起的,所以,这种分配机制在实施之初,由于人们都以企业的主人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在该原则实施之初会提高广大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但随着人们对该体制的逐步了解,会发现在该体制下由于存在对劳动差异界定的困难,按劳分配实际上就是一种平均分配,在这种条件下,“搭便车”和“偷懒”等现象在该体制下就会广泛存在,由于没有被解雇的担忧、惩罚机制的不健全和官本位现象等不平等问题的存在,又会加强这种现象的存在。所以,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也只有在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建立之初才能起到一定的积极效果。再次,从社会主义条件下要保证人们的消费倾向相近和高昂的工作积极性来看,要满足这两点主要靠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强意识形态的教育和激励,以及制定低消费的产品结构和低水平的工资结构来强制实现。这种激励措施只有在一个国家面临特殊情况和遭遇大的挑战时,在短时间内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用该激励机制来推动社会主义国家长期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行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认为社会主义计划体

制只有在一个国家面临大的挑战或处在特殊时期,以及整个国家面临某种紧迫问题时在较短期限内实施时才是有效的。

布鲁斯等学者认为,“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使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衰退,使世界上亿万人民处于灾难性的悲惨处境,给政治关系带来了极端的不稳定。这就给后者<sup>[26]</sup>的论据增加了份量:资本主义生产靠的是资产阶级动用熟练的政治技巧和残暴的物质力量,而同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相对立,这使资本主义的存活成本越来越高昂,而且存活终归是暂时的。毫无疑问,正是由于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混乱,由于人们日益认识到需要求助于国家的管制和再分配之类的经济政策,才使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更容易接受“长驱直入的社会主义”思想;……一个相关的因素是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之间经济形象的鲜明对比。在苏联,经济快速增长,失业瘟疫被消灭——社会主义月亮的黑暗还没有显露出来。”<sup>[27]</sup>

## 2. 对市场体制的新思索

“和两次大战之间的情况不同,资本主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避免了陷入萧条。尽管波动仍然存在(按本世纪 30 年代的标准看是相当温和的),然而,在战后恢复时期结束以后的至少 1/4 世纪的时期里,西方经济还是显示出确实不寻常的活力:生产和大众消费的高增长率,低失业率(在许多场合实际上为零);对生产方法和最终产品的强烈的创新倾向;以及社会保障相当可观的扩大(“福利国家”)。即使不考虑特别有活力的国家(如日本),这个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来也决不是生产力的桎梏。各个国家的绩效虽有明显的差别,但这些绩效上的差别很难按制度或按相对发展水平来加以归类。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同法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起奔腾向前;几个亚洲的市场经济(韩国、新加坡和台湾、香港地区)也从不发达状态戏剧性跃进到“新兴工业化经济”这种匆忙建立的新类别中去。”<sup>[28]</sup>布鲁斯的上述评论说明,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在二次大战以后又逐渐表现出了极大的生机和活力,这说明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将日趋走向灭亡的假定并没有出现。

布鲁斯在谈到上述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国家在二次大战以后经济步入良性轨道的缘由时,引用那些“开明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的观点阐述到,“西方实际的政策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来解释它们取得成功的

原因。”<sup>[29]</sup>“这些政策包括:国家干预的增强,如宏观经济的指导性计划(indicative planning);公共部门生产的大量增加;总支出中公共开支的更大幅度的增长;以及“看不见的手”采取的一系列其他形式的管制措施和再分配措施。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是由于逐渐引进社会主义才得到拯救的,这种方式可以认为是历史趋势重新自我肯定的表征。”<sup>[30]</sup>但布鲁斯不能完全同意这种观点,他批评指出:“如果对决定影响战后西方国家绩效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总的来说,在技术进步的主要时期内同国家作用的增强之间无疑可以找到联系。但是,决不能把这种联系解释成有利于‘长驱直入社会主义’观点的论证。即使是在国家干预的顶峰时期,西方经济也仍然基本上由市场调节。国家是在干预市场的运作,但任何时期都没有出现过马克思主义的蓝图所描绘的那种取代市场而直接配置资源的情景。”<sup>[31]</sup>但不可否认,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思想对于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改良和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过去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指导下的市场经济是一个主要靠“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的自组织机制,在这种体制下并不提倡政府对经济的调节作用,而随着“凯恩斯革命”的到来和计划体制的兴起,资本主义市场体制也开始逐步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调控和“相机治理”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兴起和试验对于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发育和改良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像前文所言,政府借助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控、对社会公共物品投入的增加、对社会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和高福利制度的实施等都可以看出计划体制影响的烙印。但不可否认,即使资本主义市场体制更多的受到了政府的影响和控制,但“看不见的手”仍是经济运行的主要调节者,它和计划体制还是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从机制设计理论中所重点关注的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两个方面来看,市场经济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两个问题。在市场体制下,由于每个经济主体的决策是自我为主的分散决策,他们在决策中不需要了解和掌握整个国民经济中每个部分的信息和数据,只需了解与自己有关方面的信息就可以很快的做出决策,这样在市场体制下信息问题可以很好解决。从激励方面来看,由于在市场体制下每个经营者和决策者是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生产单位和经济个体,个人和单位在市场关系中的收益取决于自己的努力程

度。所以,在市场体制下激励问题也可以很好解决。从机制设计理论的分析可以看出,市场体制是一个可以自发调节经济运行和持续发展的有效机制。这说明市场体制在组织和调节资源配置和社会生产方面确实比计划体制是有效率的。

但既然市场体制从其运行机理来看是有效的,那为什么会出现 20 世纪 30 年代资本主义的大危机呢?这首先的理由是资本主义市场体制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不断成熟的过程,需要自我发展和完善;另外,从市场体制的自组织运行来看,在现实世界中,市场失灵也是会发生的。如胡代光就认为,“市场失灵的原因被归结为垄断、外部效应、公共产品和信息不完全等因素对市场制度的干扰。本世纪中叶新福利经济学的兴起使市场缺陷的研究趋于系统化,最终形成了“市场失败理论”。该理论认为,矫正市场缺陷的微观经济政策可望使经济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国家应为此做出努力,承担起责任。”<sup>[32]</sup>其实,从经济学本身的发展来看,许多经济学家都对市场体制的自发秩序提出质疑,如西斯蒙第<sup>[33]</sup>、马尔萨斯<sup>[34]</sup>、穆勒<sup>[35]</sup>、霍布森<sup>[36]</sup>、庇古<sup>[37]</sup>、奈特<sup>[38]</sup>、巴托<sup>[39]</sup>、凯恩斯<sup>[40]</sup>、罗宾逊夫人<sup>[41]</sup>等等,当然 70 年代以来新福利经济学从帕雷托最优和社会福利的角度对市场缺陷做出了更进一步的揭示。新福利经济学主要从公平与效率、经济周期与失业问题、垄断与竞争问题、市场外部性问题、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信息不完善问题、市场未来的不确定性问题给予了深入的研究和剖析<sup>[42]</sup>。布坎南曾深情的说道:“在不少地方我都曾谈到:本世纪中期出现的福利经济学理论是《市场失败理论》,而在本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公共选择理论则是一个《政治失败理论》。”<sup>[43]</sup>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市场体制在其自组织的运行过程中,也不是十全十美和无懈可击的,也是需要政府在特殊时期和对一些特殊问题进行干预和协调才会取得较好的效果。虽然在“凯恩斯革命”以后由于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经济“滞胀”等现象,一些西方自由主义学者对“政府干预论”提出了批评,但从西方主要发达市场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化国家的经济发展来看,政府对经济的调节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这既是个人福利最大化并不能自行导致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市场体制运行规律的内在要求,也是由于垄断、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等市场无法自行有效克服问题的存在而产生的必然要求。所以,无论

从理论上和市场体制的实际运行结果来看,自二次大战以后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中的调控作用明显增强了。这种政府的介入也确实使得市场体制在减少经济波动、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和保证经济持续增长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sup>[44]</sup>。特别在 2009 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从世界各国对经济的调节手段来看,凯恩斯强调的国家有效调节仍是各个国家采取的主要举措。这也充分说明市场经济并不能在自组织的过程中达到完美。

### 结束语

所以,从目前来看如何做到市场与政府调控的有效结合是解决经济运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从市场体制发展和演化的长期过程来看,“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是居于基础地位和起核心作用的;政府在市场运行中的作用只能是起到一个小小的“配角”的作用,因为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政府只能在解决经济波动、保护竞争、消除外部性和提供公共产品以及改善社会福利总目标方面起到一些补充作用。另外,从自发的市场力量与政府作用的相互影响来看,两者必须有机结合才能取得较好的结果,这就要求政府的作用必须与市场体制的自发运行方向相一致,不能违背市场规律和市场自发的演化趋势,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在市场经济运行中提高市场运行的效率,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并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青木昌彦在《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时明确提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不一定是替代的,政府可以为市场制度的持续发展提供稳固的制度框架,最大限度的利用各种有利条件,补充和完善市场机制的运行效率<sup>[45]</sup>。

### 注释

[1] 一次是 20 世纪上半叶由市场体制向计划体制的转型;另一次是在 20 世纪下半叶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从 1917 年到 1950 年,占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家退出了市场经济的舞台,进行计划体制的试验。而在 20 世纪下半叶,许多已经实施计划体制的国家却又在进行计划+市场的试验,特别在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这种进程明显加快,进入 90 年代,大部分计划体制国家已完全转向了市场体制。

[2][3] 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中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1-139 页,第 52-57 页。

[4] 最高中央经济调节机关为帝国经济部,下设各专业管理局。1934 年根据“德国经济有机结构条例”,在原有企业主联合会及垄断组织基础上,设立了按部门和按地区的两类经济调节机



构,它们归帝国经济部下设的全德经济院管辖。通过各级经济集团和省经济厅系统,在有关中央管理局的协同之下,垄断资本家及法西斯政权自下而上的实现对国民经济的双重交叉控制。另外,1933年7月,在帝国经济部下面还特设了“德国经济总委员会”拥有无限权力,负责指导国家经济政策和法令的制定工作。法西斯政权通过以上种种经济调节机构,对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和领域,实行了全面的控制。

[5][6]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中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160页,第140-150页。

[7]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8]本表摘录于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9][10]林毅夫等的观点,具体参见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第279-280页。

[11]周冰《不可企及的目标——经典计划经济理论剖析》,长春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105页。

[12]毛寿龙,1995:《计划体制低效率问题再思考》,摘自2004年3月5日《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网站(Website i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Public Policy)?http://www.wiapp.com web-master@wiapp.org。

[13]郭灿鹏《中国财政体制(1949-1979)变迁的效率》〔重庆〕《改革》2001年第2期。

[14]Jurgen Habermas: *Autonomy and Solidarity*, Peter Dews (ed.), New Left Books, London, p. 91-92. 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0页。

[15]Jurgen Habermas: “What does Socialism Mean Today?”, p. 9. 转引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0页。

[16][17][18]见张仁德《比较经济体制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3页,第8页,第9页。

[19][20]胡震、宋海英、胡君旻:《过渡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第20页。

[21]前波兰副总理和国家计委主席。

[22]转引胡震、宋海英、胡君旻:《过渡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23]如社会主义国家“两弹”和“飞天”计划的实施,就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优越性。

[24]“放大效应”是指在计划体制下,各种资源的集中使用,其效力并不是这些资源的简单相加,而是会远远大于这些资源之和,也可以理解为起到了一种使国家效力曲线的向外平移的作用。

[25]“替代效应”是指政府通过控制资源和生产,把国内产品结构强制调整,使的国内资源集中于国家在某一时期特殊需要物品的生产,而降低对其他类商品的生产。如在战争时期加大军工产品的生产,而减小消费品的生产,在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加大对重、化工业的投入和生产,而相对减小对消费品的投入和

生产等等。如钢铁既可以用来生产消费品(自行车、缝纫机等)又可以用来生产机器设备,而在计划体制下通过对生产部门的倾斜发展,可以加快一国工业化的速度。这种以工业设备产品生产替代消费品生产的特点就是计划体制下的一种“替代效应”的突出表现。

[26]这里后者指的是社会主义制度。

[27]W. 布鲁斯、K.拉斯基《从马克思到市场:社会主义对经济体制的求索》,第22-23页,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3页。

[28][29][30][31]W. 布鲁斯、K.拉斯基《从马克思到市场:社会主义对经济体制的求索》,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5页,第26页,第26页,第26页。

[32]胡代光《序一》,摘自郑秉文《市场缺陷分析》〔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序言第1页。

[33]在1819年西斯蒙第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从分配不均衡、有生产过剩的危险等方面对市场体制提出疑问。

[34]在1820年马尔萨斯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认为在市场条件下商品的供给与需求难以保持一种适当的比例,提倡国家的指导作用。

[35]在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认为,竞争市场制度不可避免会产生商业危机,必须对私有制市场制度进行改良,但不是颠覆私有制。

[36]英国学者霍布森在对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呈现出的种种弊端进行揭示,并提出了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思想。

[37]在1920年底古发表了《福利经济学》,提出了资源的最优配置标准、社会福利最大化标准和经济的外部性问题。第二和第三个方面的解决都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才能达到。

[38]1923年美国的奈特在《竞争的伦理观》对市场制度提出了批判,认为市场存在信息不完全、市场会形成垄断、市场存在外部性和市场条件下的分配不均都会产生重大社会问题。

[39]1958年巴托在《市场失败分析》中认为当交易存在障碍、交易双方界限不清、社会财产权界定不清、垄断和外部性存在时,市场就会失灵。

[40]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的市场不会自动出清,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必须依靠政府的调控才能解决和完成。

[41]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罗宾逊夫人从收入分配差异、市场价格波动、市场的不可测性和投机性几个方面指出了市场制度存在的问题。

[42]郑秉文《市场缺陷分析》〔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页。

[43]Buchanan, JM: *Exploration into Constitutional Economics*,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418.

[44]关于这一点,从二次大战以后市场体制国家的经济增长与30-40年代大危机时相比就是很好的证明。

[45]青木昌彦等《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47-48页。

〔责任编辑:天 则〕